

作为蜚声古今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当时是安邦济世、勇于革新的能臣干吏，他不仅以拳拳报国之忠让人景仰有加，而且以发奋苦读的经历令人敬佩不已，比如“划粥断齑”的故事，便是对他学习精神的现身说法，告诉了我们成才的不二法门：刻苦读书学习。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其父范墉，博学而善文，历任多地节度掌书记。989年，范仲淹出生于父亲任职的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官舍。然而，天有不测，范仲淹仅两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留下他们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母亲谢氏，本是范墉继室，如今丈夫去世，犹如大厦之倾，生活顿失来源和着落。谢氏当时还年轻，贫无所依，带着她唯一的儿子改嫁祖籍滁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时任澧州安乡县（今湖南安乡县）县令的朱文翰，继父为范仲淹改姓名为朱说。

朱文翰对范仲淹并未冷眼看待，既加养育，复勤教导，视同己出，且寄予厚望，期成大器。安乡位于洞庭湖畔，在洞庭湖的海声光影里，范仲淹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接受了启蒙教育，开启了他的苦读生涯。

继父固然对范仲淹视如己出，但毕竟是重新组合的家庭，朱文翰续弦之前本已儿女成群，牵绊太多，与继室继子在感情上虽好，但毕竟难以好到水乳交融，尤其在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接洽中，常常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和隔阂。尽管范仲淹暂时并不知道身世真相，但间或渗透出来的这种疏离感，让他们母子生出寄人篱下的愁绪，加上生活上依然贫困窘迫，童蒙至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因此备尝攻苦食淡的艰辛。然而，正是这种艰辛，磨炼了范仲淹的意志，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在学习上尤其如此。

历史上有很多励志苦读的故事，诸如战国时期苏秦“悬梁刺股”，汉代匡衡“凿壁偷光”，晋代孙康“映雪囊萤”，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千百年来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范仲淹苦读的程度并不亚于上述人



晏建怀



物，他从小好书如命，读书不辍，特别是多次迁居的青少年时代，每迁一地，都留下了刻苦读书的感人的故事。在湖南安乡，范仲淹受父母安排，曾读书于当地兴国观，自励自觉，坚持不懈。宋朝人任友龙在《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一文中说：“初，文正公（范仲淹）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当时的范仲淹七岁左右，不仅早慧，而且耐苦，这为他后来更加发奋奠定了基础。后来，安乡人民为纪念他，曾在他读书的地方建读书台，且有诗句曰：“荒台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书台夜雨”这清寂而优美的诗意，使少年范仲淹苦读的景像，永远留在后人的心里。

安乡之后，范仲淹随继父任职的变化而先后流寓池州（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滁州（今山东淄博市）等地。在池州，范仲淹读书于州治之东青阳县的长山，因为范仲淹读书于此故，后人将长山改名为“读书山”。继父虽为官宦，却非显要，收入微薄，兼之家中人口多、负担重，对范仲淹生活上的照顾难免捉襟见肘，不过范仲淹专注于学，不以为意。

随着学识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范仲淹开始自觉磨练意志，由要我读

书变成了我要读书，逐渐确立了卓尔不群的人格，虽瓦灶绳床、恶衣蔬食亦不改其志。朱文翰调任滁州长史后，年届弱冠的范仲淹回到继父的故乡滁州长山县，潜心读书于县南长白山的醴泉寺，生活极为困苦。据宋朝人彭乘《墨客挥犀》一书记载，四十多年后，范仲淹曾与彭乘、李丁二位后生进士交谈中说：“……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窶，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嚼之，如此者三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却后用刀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为食，然后将腌菜、酱菜之类切成碎末，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拌粥，如此这般苦读了三年。这就是范仲淹“划粥断齑”典故的由来。

很多人都知道，读书一定程度上是要靠体力的，体力很重要的一面来自于营养。彼时范仲淹刚满二十，又恰在长身体的年龄，长身体与刻苦学习都急需营养补给，但他旦暮间却只有断齑粥粥为继，其清苦之极，可见一斑。然而，范仲淹凭借坚强的意志，饥亦能忍，苦亦能乐，当时还作《董贻》自嘲道：“陶家瓮内，淹（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意思是说，陶瓮里腌成的黄

菘，有碧绿青黄之美，在我这贫寒的读书人口中，咀嚼出悠扬动听的音乐。在《董贻》里，生活的苦楚都被这有趣的比喻给稀释掉了，充满着旷达和乐观。这就是范仲淹与众不同的地方——逆境中愈立志，困苦中愈自奋。

如果说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是他自觉读书的表现，那么多年以后他到南京（即应天府，也称南都，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应天书院求学，则是为自立而读书了。幼年丧父乃人生大痛，当范仲淹后来终于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时，不异于当头棒喝。事情是这样的：范仲淹平时节衣缩食，他的兄弟们却穿拣好的来、吃拣好的要，浪费不知节俭。范仲淹好心相劝，得到的回答却是：我用朱家钱，关你何事？范仲淹听后惊骇莫名，当他疑惧之下终于打听到自己的真实身世后，内心的痛苦与忧愤积聚而发，毅然离开了朱家，负琴携剑，求学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奋读书、学成迎母。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

在应天书院求学，由于脱离了朱家，生活一度没了着落，有一顿没一顿的，异常艰难。宋朝人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上说他：“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还说：“公处南都学

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齑粥不充，日昃始食。”在应天书院，范仲淹孜孜求学，极度刻苦，仿佛带着使命在读书，尽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睡得很短，吃得很少，倦怠时以凉水浇脸，饥饿时以稀粥为食，五年未解衣就枕，读书求学之苦，达到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程度。

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钦佩又同情，便把他的情况转告父亲。留守很受感动，送了一些营养美味的饭菜给范仲淹，算是对他的肯定和嘉许。然而，范仲淹却婉言谢绝了，并充满感激地说：我不是不领受您的深情厚谊，只是自己喝粥习惯了，也不觉得苦。一旦享受了您赏赐的丰盛饮食，以后再喝粥就索然无味了。

还有一次，当朝皇帝宋真宗幸临南京，南京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瞻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埋头于书海。同学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将来进见也不晚。

范仲淹一时如此，一世如此，既不在意生活的艰苦，清贫自甘，清苦亦乐；也不关注眼前的得失，心若止水，久久为功。正因为这样，才有他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及追求这种理

《淮南子》中的廉政观

李 娟

《淮南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集体创作的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融合儒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各家思想之所长，为国家施行长治久安之策提供有益参考，是对新近统一、尚不稳定的西汉王朝政治和文化的一次有力介入。《淮南子》一书旨在“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廉政兴国观念。

“不以利害义”

义即道义，利指利益，二者之关系是中国古代廉洁从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合理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先秦诸子针对义利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儒家倡导重义轻利，法家倡导崇法尚利，墨家倡导义兼利，道家倡导义利俱轻，其中尤以儒家的义利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淮南子》吸收、整合并发展了先秦诸子的义利观，形成了融合于自己思想体系的义利观。

一方面，其认可儒家关于义利观的主流观点，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且义高于利。《缪称训》有云：“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认为求义是人心所愿。同时，《缪称训》将人们对待义与利的取舍态度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认为君子是重义轻利的，而小人是舍义取利的。

另一方面，《淮南子》认为义与利又是相统一的，重义轻利并不意味着对利的舍弃，而对利的追求是否符合道德准则则取决于取利的目的，若取利的目的是利民、利天下，则可称之谓为公义，即所谓尚义为公。《脩务训》中说：“夫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圣人一心只为民谋利、为天下谋利，这样的利争取得越多，则为民造福越多。而对于前车之鉴秦国的

“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之为，《淮南子》则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古代官吏对义与利之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直接决定了其施政行为的有效性，崇德尚义、廉洁为公则会得民心，反之，则会失民心。

民惟邦本

《主术训》有云：“民者国之本也”，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安民、利民、富民的政策主张。顺接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淮南子》亦将国君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比作城墙与基础的关系、树木与根系的关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土宁”，充分肯定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基于民本思想，廉洁治国成为《淮南子》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经训》通过探究衰世、末世、桀纣之世灭亡的根源以警醒后世，指出若“攘天下，虐百姓”则会致“亡天下”。

首先，《淮南子》强调为政者要一心系民。民心是统治国家的关键，若统治者能做到“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时刻将人民的安危与冷暖系于心上，则会稳固国家的统治、推动社会的发展。

其次，《淮南子》倡导勤政为民。勤政与廉政是有效施政的两个关键环节，二者紧密关联，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作为廉政为民的基础，勤政为民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在这一点上，《淮南子》继承性发展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积极的无为观。《主术训》中说道：“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又言：“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脩封疆，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脩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昂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强调治国为政要“应时脩备”，因势利导，积极按照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办事，以“富国利民”。

再次，《淮南子》主张宁民简



政。“夫水浊则鱼喻，政苛则民乱”，如果为政者“取而无量”“桀于其下，侵渔其民”，贪欲无穷，没有节制，则为末世之政，致使“天下不安其性”。因而明君必会“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征取赋税必先估量百姓一年的收成，衡量百姓的承受能力，亦会立足于“省事而易治”，通过“勿夺时”“省事”“节欲”等来减轻百姓的负担，“政令约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最后，《淮南子》注重民生，提倡利民、富民。《淮南子》中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充分体现了其对利民思想的重视程度。民生基于廉，廉则民利。《淮南子》重视兴利、除弊，《主术训》倡导为政者要“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积极开发于民有利之事，鼓励引导百姓遵循天时发展生产，并通过“先王之法”告诫人们要索取有度，不可只顾眼前利益，“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君廉、吏廉、民廉

首先，《淮南子》认为君廉则邦兴，君贪则国亡。君主历来是决定王

朝命运的关键，一方面应当“廉洁守节”、清廉自持，秉承道家的治国理念，“处无为之事”，“清静而不动”，克制各种“嗜欲”，注重自身的廉洁修养。《本经训》告诫国君：“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国君的放纵淫逸是祸乱产生的原因，秦王朝的覆灭即是深刻的教训。另一方面，“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其所行”，故君主应当慎行垂范，“俭约以率下”，作好廉洁表率。具有进步意义的是，《主术训》提出要“立法禁君”，“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要求国君“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既从德行上要求国君，又从法度上制约和规范国君，体现了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其次，主张“治国先治吏”。《淮南子》中除了非常重视各级官吏的内容在廉洁修养，要求官吏在从政过程中做到廉洁自守、慎独正己，并主张以“法”行“廉”，将法作为“天下之度量”进行外在的制度建设，还讲求以“术”行“廉”。认为“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若君臣不和不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因此国君要“执术而御之”、“明分以示之”，以防止和避免官吏贪污渎职、结党营私、以乱邦国。

再次，清廉环境的实现与广大民众对廉耻之风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因此，为政者一方面要“先自为检式仪表”，率先垂范；另一方面要化民成俗，使其“知礼义”“崇善废丑”，形成重厚朴恣之廉风，进而熏染各级官吏，营造社会化的廉洁从政氛围。

历史文化

典籍

想抱负的坚韧与执著。范仲淹从小慧极聪敏，才调秀出，寝馈书山，苦读不止。先天的禀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使范仲淹学业大进。1015年，他终于金榜题名，高中进士，朝廷即授他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他忠心报国、赤诚为民的仕宦生涯。

范仲淹先后历职州县，曾主政苏州、开封等地，颇有政绩。后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镇守西北，又被宋仁宗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改革，成就卓著。为政如此，为文亦不俗，诗、词、文俱佳，一篇《岳阳楼记》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爱国情怀如浪涛奔涌，遂成千古名篇，至今感人肺腑。

范仲淹还是一个不随俗、不折中、不苟且的人，立朝、任事、建言，每每一往无前，宁折不弯。而且，这种人无论置于何处，无论位居显要，抑或投闲置散，都会执念一处，竭尽所能，忠君谋国，利泽生民。正如金朝人元好问评价他所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故范仲淹终能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名臣。

如果没有沙石植入体内的苦痛，河蚌怎会孕育出璀璨的珍珠？任何一个人的丰功伟绩，都不难从最初的表现找到精神的源头。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价值取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担当，以及为国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实都发端于他青少年时期“划粥断齑”的自我砥砺，如同破茧成蝶、凤凰涅槃所必须经历那一番痛苦到濒死的淬炼一样。或许可以说，范仲淹为文以古为师、以心为师，而为学，则扎扎实实是以勤为师、以苦为师，苦读是他成才的奥秘，舍此无他。



典故中的历史

中国古代各个学派在观念上总是各执己见，但在一个问题上，各家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民生、民本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很早就确立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以民为基”的思想。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切权力都应该建立在民众这一基础之上。只有爱民、富民、为民，才能取信于民，国家才会稳固。

为官者要关心人民疾苦，哀民生之多艰。真正做到爱民、富民、惠民、教民，把民生问题放到治理国家中最突出的位置，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屈原在《离骚》中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郑板桥也曾发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感叹。在封建时代，那些真正关心民间疾苦，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官员，一直受到后世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是稳定社会的第一大要素。在齐文化中，富民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管子的后继者晏子提出“以民为本”。而作为儒家的孔子，同样也非常重视富民问题，主张要富民并认为民富要优先于国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富民是国富的基础，但民富并不是终极目的，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果只把目标停留在民富的层面，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欲望横流的社会。因此在百姓达到富裕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教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公民道德教育。《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到卫国去，赞叹道：这个国家人真多啊！冉有问道：人口已经这样多了，该怎么办？孔子答道：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人们富裕起来了，又该如何？孔子回答道：教之。

孟子也主张，百姓在有了“恒产”以后，在“饱食、暖衣、逸居”后，接下来就要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让老百姓接受道德教化，让普天下的老百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让天下苍生都能够生活得幸福、安宁。



王 杰

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认识到，要取得民众的支持，就要顺应民心，取信于民。这是从民心向背决定王朝盛衰的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管子》就说，为政者办任何事情都要“顺民心”“量民力”，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政德

大家谈